

采访与记者修养

商 恺
戴 邦
田 流
吴 象
等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CAIFANGYUJIZHE XIUYANG

采访和记者修养

商 恺 田 流 等著
戴 邦 吴 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
研究生院新闻系

人民日报出版社

采访和记者修养

商 怡 田 流 等著
戴 邦 吴 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
研究生院新闻系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林海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印张：11 字数：230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林海日报社印刷厂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定价：1.25元
书号：3132.046

目 录

当你即将走上新闻岗位的时候

——从做记者的体会谈起	商 恺	(1)
采访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	田 流	(47)
采访态度和采访准备	戴 邦	(58)
几种常用的采访方法	艾 丰	(70)
农村调查与新闻写作	吴 象	(89)
短期国外采访杂谈	裴 达	(104)
新闻采编工作浅议	安子贞	(122)
认真学习老记者的采访经验	鹿 舫	(131)
新闻工作者的政策修养	姚力文	(163)
新闻工作者的资料积累	燕 凌	(171)
新闻工作者的日常学习	袁 良	(190)
哲学与新闻	颜景政	(211)
政治经济学与新闻实践	肖体焕	(248)
新闻工作者的古典文学修养	艺 舟	(264)
历史与新闻	陈祖声	(296)
社会学与新闻工作	王锦鹄	(304)
科技知识与新闻报道	罗荣兴	(319)
编者说明		(344)

当你即将走上新闻岗位的时候

——从做记者的体会谈起

商 恺

同学们，你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的研究生，新闻业务专业主要是培养记者和编辑的。这说明你们很快就要走上新闻工作岗位了。我看你们大都是从家门走进学校门的年轻人，可能从书本上学了不少新闻学的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但是没有参加过或很少参加过新闻工作的实践。新闻系要我来讲讲从事新闻工作的体会，我就毫不谦虚地答应下来了。新闻工作的领域是很广阔的。我在新闻工作的岗位上不是多面手，基本上是一条腿走路——长期做记者工作。因此，今天只能谈谈做记者的体会，当然，在许多地方要联系到自己，这就难免有突出个人之嫌。

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历史，如果从1938年参加冀鲁青年记者团算起，足有四十五年了；如果从1948年正式到人民日报社算起，也有三十五年了。当然这中间还断断续续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长期的干校生活，浪费了我十余年的宝贵时光。现在老了，抚今追往，一方面痛惜流失的年华已不可再来，另一方面也有一点豁然开

朗之感。过去好比爬山，在荆棘丛中，在崎岖路上，经过半世的摸索、攀沿，登上了山巅，再回头下望，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就历历在目了。现在就将记者生活道路上感受比较深的几个问题谈一谈，对你们或许还有点参考价值。

一、要有献身新闻事业的坚强意志

现在，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报考新闻系？”我想你们一定会这样回答：“新闻事业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因此，在新闻岗位上做一个编辑和记者，是重要而又光荣的职务。”我相信这是真的。但是，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你们不说我也会猜得到，那就是看着做一个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做一个记者，很潇洒，很自由，可以不在办公室里坐班，愿意见什么人就可以见什么人，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写了文章登在报上，还可以出名，多么美好的职业呀！你们说，有这样的想法吗？不要瞒我，我是过来人。当年我参加新闻工作的前后，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我接触过一些年轻的记者，他们的想法，也和我一样。其实，这是不奇怪的。青年人嘛，谁都会有过一些美丽的幻想。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至少是片面的。你们所看到的记者不坐班，到处跑，自由自在，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另外，它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艰苦的一面，也可以说是艰险的一面。

为什么说记者工作是艰险的呢？关于这一点，你们体会不

到，因为你们没有生长在那个历史时代。在旧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要想做一个进步的正直的新闻记者，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有被捕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大家如果读过中国报刊史，都会知道邵飘萍这个人。他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个以正直、爱国和进步而著名的记者。他从二十一岁就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他有一句名言：“余百无一嗜，唯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兴趣，愿终生以之。”（《致潘即昂书》）他在从事新闻事业的过程中，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坚定了他同腐恶势力作斗争的决心。他为了实现对新闻事业“终生以之”的誓言，抱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忍受着经济生活上的困苦，躲避着军阀政府的追捕和迫害，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京报》，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启蒙作用。这自然不能为当时的军阀政府所容，终于被军阀头子张作霖所杀害。杰出的一代报人邵飘萍，为新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只有四十二岁。

邹韬奋也是我国三十年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为了唤醒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从事新闻事业，长期受着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曾六次流亡，一度入狱，历尽艰险，长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艰险，丝毫没有动摇他献身新闻事业的决心，相反地，他愈战愈强，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在抗日战争以前的中学时代，就是邹韬奋的《大众生活》、《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他那时为了革命，为了救国，为了替人民服务，而不畏强暴和艰险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这和我后来走上新闻工作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都读过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美国记者斯诺的

《西行漫记》吧？这两部作品，打破了国民党政府的封锁，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了全国和全世界。这是三十年代震撼世界的新闻，是新闻界的光荣。这对一个记者来说，也是最大的荣誉。你们说，这两部新闻作品是轻而易举采写出来的吗？范长江当年是大学里的一个学生，不过二十五六岁，但是他有抱负，有理想，立志要用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当他选择了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政治动向”这个题目以后，决心走出书斋，离开学校，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当时的情况可不象现在这样，记者出差有汽车，有火车，有介绍信，还可以住高级宾馆。当年范长江的西北之行，是什么情况呢？一方面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一方面要忍受着路途上的艰难险阻，地方军阀，反动豪绅，毒蛇野兽，急流险滩，荒无人烟的沙漠，终年积雪的高山，时时处处威胁着他的安全。但是他仗着一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深入实际考察采访，行程四千里，收集到了第一手材料，向全国人民揭示了大西北人民贫穷苦难的根源是腐败没落的政治制度。

美国记者斯诺，同样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毅力、意志坚强、不畏艰险的记者。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一年，他为了探索和揭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之谜，决心深入陕甘宁边区实地考察。他当时曾想，“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的真象，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斯诺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线，进入了陕甘宁边区。他

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斯诺的《西行漫记》（那时的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我在抗日战争初期就读到了。我一直为他们那种敢于冒险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所感动，从那时候起，我就爱上了新闻事业，暗暗下了做一个记者的决心。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为做一个正式新闻记者努力创造条件，编辑地方报刊，为《鲁西日报》和《冀鲁豫日报》做通讯员。这些工作都使我得到了锻炼，为以后做《人民日报》的记者做了准备。

我正式参加人民日报工作的时候，正是全国胜利的前夕，不久便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做一个记者，该是很舒适很安逸了吧？但是，根据我三十多年来的体会，深感记者工作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是相当艰苦的。这种艰苦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记者活动在广阔的天地间，为了深入现场采访，有时要爬高山，钻密林；有时要涉江河，走险路；要受得住南方的酷热，要耐得了北方的严寒；要经常生活在车上船上，风里雨里，过着紧张的流动的生活，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那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孟子说过“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做记者也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记者采访的事物，往往是十分复杂的，千变万化的，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真实的情况，把握住问题的实质，作出正确的判断，必须进行深入地调查，细心地探索，反复地研究，有时候为了追踪一个线索，常常日夜兼行，要跑几十或几百里的路程。采访结束，要准确地迅速地写出来。写作首先要经过艰苦的构思，废寝忘食地推敲琢磨，反来复去地修改，才能成篇。有时为

了寻求一个适当的词汇，或者思考一个新鲜的标题，往往夜不成眠，走路吃饭都要考虑它。一篇报道定稿以前，什么戏剧、电影、精彩的球赛，都没有心思去看它。可是当一篇报道刚刚发稿，第二篇报道又要开始采写了。往复循环，永远没个尽头。此外，记者生活中还长期顶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是如果你一个月不在报上露面，两个月不在报上露面，到第三个月还不见发表你的报道，你就会坐卧不安，饭也无味了，这种压力可有千钧重啊！总之，记者这种思想上的艰苦，是别人摸不着，看不见，也体会不到的。所以说，记者工作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工作之一，它和其它学术和科学的研究一样，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有人曾把记者的采访和写作比作跋涉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上，只有具备骆驼一样的不畏艰难的坚毅精神，才能任重致远。一个记者，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不能为新闻事业付出他的毕生精力，这个工作是坚持不下去的，即使马马虎虎混下去，也难以获得什么成就。

今天，我不是吓唬你们，而是希望你们认真做好思想准备，以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斯诺及新闻界的许多老前辈为榜样，根绝一切犹豫，消除任何怯懦，以无畏的勇气攀登新闻事业的高峰，不要被艰苦吓回去。范长江说过，做记者是苦事情，但是如果有理想有事业心，对自己的职业有浓厚的兴趣，就不会觉得苦了。理想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面前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为了弄清一个问题，有时候甚至要研究它十年八年，而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会感到无限的快乐，这是记者的快乐。

二、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刚刚走上新闻岗位的青年记者，由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精神是非常兴奋的。兴奋之余，差不多都有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和写作计划，要在短期内写出又多又好、有影响的报道来，心中还暗暗希望早日成为名记者。这个决心和愿望当然是很好的，值得鼓励。但是，年轻人虽然也学到了不少哲学道理，终究阅世较浅，因此往往把复杂的事物看得很简单，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现在，不看过去，容易用静止的眼光去看待千变万化的世界。对一些问题还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便往往轻易地做出判断。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当形势发展顺利，一些实际工作者头脑发热的时候，记者也最容易受感染，跟着发热。当一些实际工作者过高估计了主观能动性，盲目蛮干瞎指挥的时候，记者也最容易闻风而动，跟着摇旗呐喊。结果写出的报道，十之八九是主观的、片面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这不是有意贬低年轻记者，即便年纪大一点的记者，也不能担保自己不犯主观主义、片面性的错误。因为做记者的一个共同弱点，就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虽然也学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一到实际运用的时候，就不那么灵了。现在讲一个我自己经历的真实故事：

1957年，人们的头脑已经开始发热了，“大跃进”这个口号已经提了出来。当时报纸上惯用的手法是，“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一再批判那些不提高生产指标，不相信高产量的人为右倾、保守派。当时我在山西采访，省委在讨

论全省农业生产规划的过程中，所谓“先进”思想战胜了“保守”思想，计划到1962年全省粮食平均亩产量由1957年的120斤提高到400斤，争取500斤，到1967年达到600斤，争取800斤。看来这的确是一个“跃进”计划。当时我也很兴奋，心想可抓到了一个大题目。为了给这个“跃进”计划找根据，我收集了各地一些工作报告，召开了一些座谈会，就根据这些材料，写成了一篇一万六千字的长篇通讯，题目是《山西省粮食生产能不能实现大跃进？》，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引人注意的题目。通讯一开头就说，“现在跃进思想已经在全省占了上风，保守思想被打得落花流水。”你们听，简单化到了什么程度？通讯接着说，“但是，保守思想不会认输，今后还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要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还必须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和保守思想进行斗争。”你们听，真是气势汹汹！怎样作斗争呢？通讯说，“经验告诉我们，批判保守思想最有力的武器，是对客观条件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用无可争辩的事实，去驳斥保守主义者们的片面根据。”这话从表面上看也许是对的，但是举出的事实是不是无可争辩呢？现在看看通讯对山西省的客观条件是怎样分析的吧：文中倒是首先老老实实地列举了影响全省农业发展的恶劣的自然条件，说全省“大都是光山秃岭，缺乏覆盖，既不能调节气候，又不能涵养雨水”，“水土流失已成为全省普遍现象”，“带来的最大危害是自然灾害的连续袭击，十年九旱，遇水成灾，春旱秋涝，涝后再旱，已经形成了自然规律”；“霜冻对于晋中晋南的小麦，对于晋北和晋东南的农作物影响也很大，每年减产三至五亿斤”；“全省大约还有二千三百万亩粮食低产区，占全省粮

食播种面积的40%，这些地区粮食平均亩产量一直停留在四十至八十斤的低水平上，遇到大灾年，则是颗粒无收”。又说，“困难的自然条件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升速度极为缓慢，而且升降幅度很大，极不稳定”。通讯举例说，“从1953年到1957年间，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一直在130斤的水平上下摇摆。”你们看，就这样的恶劣自然条件，这么低的生产水平，能在五年之内上升到400斤并争取500斤吗？如果有点起码的农业常识或懂一点看问题的辩证法，就会一眼看穿，这不是一个什么跃进计划而是一个冒进计划。你们再看看通讯对自然条件是怎样分析的呢？我笔锋一转，写道“山西省的自然条件固然有困难的一面，但不是不可改变的”。接着举例说，“晋西和晋西北地区低产面貌完全能够改变”，“雁北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太行、太岳山区粮食增产潜力非常雄厚”，“汾河滹沱河流域粮食产量可以大跃进”。这每个地区的跃进结论都是用这些地区改变自然取得增产的高产社队的典型，以偏概全得出来的。象在雁北找到了高进才治理大泉山的经验，在晋东南找到了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并且说“金星社平均亩产量达到488斤，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其他地区同样蕴藏着488斤的潜力。自然条件不好的金星社，既然能够迅速的大量的增产，那么自然条件和金星社类似或者较好的地方，为什么不能迅速大量地增产呢？”通讯经过这样强词夺理地分析以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既然客观条件存在着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可能，那么剩下的问题就“事在人为”了，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自然，是做征服自然的勇士呢？还是做顺从自然的奴隶？通讯最后

说：“只要有金星社这样一股革命干劲，苦战三年或五年，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山西省的自然面貌，实现粮食生产大跃进。”其实，金星社也不是用了三年五年改变了自然面貌的。

现在重读这篇通讯，就很清楚了，它是在记者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写的产物，从头至尾采取了以偏概全的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手法，得出的是脱离实际的结论。幸好这篇通讯没有发表，否则，个人丢丑事小，对山西省工作中的冒进思想，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会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到处在“大办”，到处在放高产“卫星”。在“高潮”的日子里，当记者的怎么能坐得住呢？我也跟着人们离开北京到各地去“观潮”了。我虽然也为当时的国内形势所鼓舞，但是当我看到用好铁炼的“钢”象豆腐渣，几十亩水稻并成一亩的弄虚作假，遍野灯火通明浪费人力的深翻土地，到处愁着“粮食多了怎么办？”到处嚷着“吃饭不要钱”，联系自己写《山西省粮食生产能不能实现大跃进？》这篇通讯的经验，我开始怀疑了，头脑也不那么热了。记者是要写稿子的，可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不能昧着良心去跟着造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勇气去揭发，但是我可以保持沉默。

今天为什么要翻腾出二十多年前的这个故事来呢？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做记者的很容易头脑发热，犯主观主义片面性的错误，在新闻报道中喜欢赶浪头。这是一个记者最致命的地方。刘少奇同志1961年在湖南做调查的时候曾说过：

“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中的瞎指挥风，在政策理论宣传中的片面性，对实际

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但是“大跃进”报道中的苦头，并没有完全教育我们的记者，当遇到了适宜的环境和气候的时候，有些记者又旧病复发了。在十年动乱期间，不是有的人就盲目地附合“四人帮”提出的“事实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谬论吗？不是出现了许多随意夸大事实，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的假报道吗？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除了极少数人，由于极端个人主义作怪，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明知不是事实，而故意造假以外，绝大多数人主要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观察客观事物，分析客观事物的时候，缺乏识别能力，以致盲目紧跟，受骗上当。所以胡耀邦同志特别号召报刊宣传工作者，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说：“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对我们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宣传工作、理论工作、报刊工作干部，是一个根本的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问题。”通过回忆过去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胡耀邦同志对我们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因为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帮助群众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动员群众改造并推动世界向前发展。客观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引导群众去分析和认识客观事物的变化，并指出它的发展趋势，决定行动方向，会把群众引导到邪路上去。

要想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很容易的。周扬同志说过：“信仰上可以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你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思想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就很难说了。”

因此，我们要想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想用正确的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判断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写出真正反映客观实际的报道，就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必须认真学习，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努力去参加实践。当然我们的实践，不一定象工人农民那样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是我们必须深入到实际中去，群众中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你真正学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使你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无所畏惧，才能经得起风浪，才能敢于坚持真理，维护真理，不随波逐流，不随声附合，不屈服于任何人的压力，不写违心的报道。

三、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论是做什么工作，包括采写新闻报道，都必须深入实际，接触实际，认识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一切工作包括采写新闻报道的基础，这是做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起码要求。

要想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你所采写的新闻报道的观点、论据和结论都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脱离实际情况，只有学会做调查研究，经常做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方法。

刘少奇同志在给新闻界谈话的时候，曾经说过：“报纸工作人员是什么人？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纸上的一切文章，都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他又说：“调查研

究是一门学问，在这方面我看你们的学问还不深，对调查研究还很不行，要了解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这话完全打中了我们的弱点。我们在调查研究方面为什么“还很不行”呢？根据我的体会，主要是没有解决好从何出发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呢？还是从主观主义出发？这是调查研究的关键问题。我感到我们长期做记者的，虽然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采访，但是终究和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和劳动者不同，总是和实际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职业上的弱点，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再加上从上边听来的东西比较多，因此在调查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也就很容易带着先入为主的框框去套客观实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自己的口味和需要听意见，找材料，甚至根据框框裁剪事实，最后很容易得出违背实际情况的错误结论。

现在来回顾一下二十多年前去湖南作农村调查的情况。那是在1961年的二三月间，中央要我们去湖南农村作调查的目的是，看看农村公社化大跃进以后，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存在着什么问题。我们要调查的项目很多，其中一个最敏感的是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按照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调查内容应该包括食堂的基本情况，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那个为主？食堂的发展方向如何？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头脑里就装着一个支持“新生事物”的框框：公共食堂只能巩固，不能削弱。我们到了长沙县的先进单位——天华生产大队。天天在他们的公共食堂里和社员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每逢提起公共食堂，干部群众无不齐声说好。我们在这里一连调查了两三个月，最后写出了关于天华大队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公共食堂的问